

說東道西集

馬鐵丁著



說 東 道 西 集

馬 鉄 丁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陽 門 內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号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号 819 字數 153,000 開本 757×1092 $\frac{1}{32}$ 印張 8 $\frac{13}{16}$ 插頁 2

195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39900 册

定價() 0.70 元

目 录

丁、陈反党集团透视.....	1
斥“抗上是美德”.....	14
爱羽毛的人.....	17
駁‘論友爱’.....	20
論歌德派.....	30
你的立場在哪里？.....	34
从杀父之仇看“草木篇”.....	40
人民的立場，还是反人民的立場？.....	43
为什么放出一支毒箭？.....	46
哀吊与憤怒.....	49
言行之間.....	53
“整”与“被整”.....	58
不务正業.....	60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	61
維護守主义.....	66
論“变”与“不变”.....	74
斥“求得心理的平衡”之类.....	82
批判徐懋庸.....	85

生活陰暗？還是眼睛陰暗？·····	107
讀“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学”后記·····	115
文艺这条路·····	120
“打”和“捧”·····	122
談肯定與否定·····	126
創作需要鼓勵，批評需要支持·····	129
一点希望·····	132
“来得干脆”·····	134
作者自己的意見何處去了？·····	135
在生活的激流中生根、開花、結實·····	136
海闊天空·····	145
“淌得很”·····	147
从一千多人加入法国共产党說起·····	149
向張忠發連隊走去！·····	151
过年·····	154
讀“老年監督崗”后記·····	157
斥浪蕩子作風·····	159
从“新風气”說到“一陣風”·····	162
照搬無誤·····	164
到下面去的阻力何在？·····	165
“原則”和“例外”·····	168

从打羽毛球想起来的·····	170
看鲁迅博物馆有感·····	171
漫步西四有感·····	173
勇气从何而来? ·····	174
略論好管“閑”事·····	178
“拿来主义”·····	181
英雄和詩人·····	186
“時間脫銷”·····	188
自以为是的教訓·····	191
旧事重提·····	194
弥补缺陷·····	197
真金不怕火·····	201
工作、爱情·····	204
“虛心使人进步”·····	208
在新生力量前面·····	211
妒嫉·····	212
母女两个人的心·····	213
环境和我·····	214
幸福的追求·····	225
職業的煩惱·····	233
关于爱人的美·····	241
附录：也談关于爱人外形的美·····	247

当求爱被拒絕的时候.....	250
爭論种种.....	255
自由、自覺和紀律.....	264
略論“新聞自由”.....	269
后記.....	275

丁、陈反党集团透视

我們的發言，想概括地談一談对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些看法。

从表面上看，这个反党集团既沒有成文的反党綱領，也沒有“团”章，也沒有公开地标榜反对馬克思主义。

但是，这正是它的一个特点。它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又是党内的一支反党的势力，由于党的崇高的威信，由于馬克思主义的崇高威信，他們如果公开地拿出一套綱領、“团”章之类，他們一天也存在不了，而馬上被人唾弃的。因此，他們总是标榜着“保衛党”，也經常宣称是拥护馬克思主义的；然而，这仍然不能說，他們就沒有有什么共同的綱領，共同的組織手段，共同的思想基础。

丁玲、陈企霞、馮雪峰等人都是些極端的个人主义者，利欲熏心的个人野心家。他們所追求的概括起来就是：权力多些多些更多些；名望大些大些更大些；地位高些高些更高些。

丁玲曾在一个时期內，担任那么一些重要的工作，包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書記、副主席，文艺报、文学講習所的負責人，她还不滿足，还講“我是靠苏联吃飯

的”，陈企霞公然篡改党所給予他的职位名义。党要他当文艺报的副主編，他却和丁玲共謀改为文艺报的主編，自己給自己加官进爵。馮雪峰并不好些。他在重庆的时候，曾經見到毛主席，毛主席要他不要脫离自己的崗位。这本是一片好心。馮雪峰既然長期地在文化、文艺战綫上做工作，毛主席希望他繼續在这个崗位發揮自己的力量，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嗎？馮雪峰反而私自对胡風說：“我知道他們不会給我什么工作做的。”这里所說的他們自然是党。他仿佛是站在党之外的，此其一；其次，完全可以看出：單是文化、文艺工作是不算工作的，是不能滿足他的私欲的。艾青嘴上很清高，什么“生不用封万户侯”之类，其实呢？副院長不滿足，一定要当院長，何其芳同志的名字排在他的前面，說成什么把何其芳压在他的头上。我們想：“生不用封万户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加上一个簡單的注解就較為确当了。生不用封万户侯——酸葡萄，但願一識韓荊州——在葡萄架下搭一張梯子。还有李又然就更其不用說了。他說：“我是一个小人物，但当大事情落在我的头上，我也就变为大人物了。”即使当他在受到同志們严正批評的时候，也念念不忘要当一个大人物的。他們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很大的个人野心。但是，在我們这个时代里，个人野心是不会不受到挫折的，因此，帶來了他們又有一共同的特点，名叫复仇主义。他們的个人主义的一切，那是动不得的。如果你动一动，他就要向你复仇。

陈企霞說：“我有瘋狂的报复主义。”

整風初期，馮雪峰号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馮雪峰号召“向党提意見，要狂風暴雨，要用大民主方式”，馮雪峰又号召在整風中可以“打人，罵人，拍桌子”。

与此同时，李又然說：“我要杀人，”陈企霞說：“我要放火。”

馮雪峰的复仇主义思想，还表現在“火獄”那篇文章里。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觉得自己也在火海的中間，自由地游泳着，我享受着生命的自由，人类的胜利的喜悅……

“我感到真的快乐，真的自由的騰欢的时刻。

“我于是想，复仇的快乐是看見敌人化为塵埃，而置他于永劫不复的烏有的境地。然而更在于自由的騰飞，自由的欢喜之無限制的翱翔。……

“我于是想，这火獄的用場，便在于用敌人的消灭，来产生我們的欢快，而以我們的欢快，去照耀敌人的消灭。”

首先，且不去追究“柏林大火”是帝国主义通訊社嫁禍于苏联的捏造。就算是实有其事，馮雪峰又是采取什么态度呢？馮雪峰陶醉在柏林的火海里，認為那是“自由的、喜悅的、快乐的、騰欢的”。是完全失去理性的癲狂，是沒落階級“玉石俱焚”的情緒反映。

我們認為这种看法是完全錯誤的，苏軍解放柏林，并不是去結仇，而是解放德国人民，和德国人民携起手来，

共同推翻法西斯暴政。

丁玲的复仇主义思想，那更是历史悠久的。

旧社会的病态之一，就是重男轻女，玩弄女性，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女的“玩弄男性”，其实也就是女的向男的复仇。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进一步把这种思想发展了。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之后，有一个“附及”。我们不能因为它是“附及”，就把它忽略过去的。“附及”中写道：“文章已经写完了……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

丁玲这段话虽然比较含蓄，然而把这个“附及”和正文联系在一起看，复仇主义的情绪仍然可以看得出来。她号召女人向男人复仇，一般干部向领导干部复仇，不骑马的向骑马的复仇。或者换另外一个说法，她号召女人“翻”男人的“案”；一般干部“翻”首长的“案”，不骑马的“翻”骑马的“案”，“三八节有感”或许也可以当作一篇绝妙的翻案文章吧？

全国解放以后，丁玲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党根据证据整实的材料，对她的严重错误作了处理，又认为这是党把她推进坟墓里去，千方百计地进行翻案活动，而且丧心病狂地要在十月间文代会的时候，宣告退出作家协会，借此对党威胁，叫党难堪。

这种复仇主义，是个人主义發展到極端的一种个人無政府主义的思想。丁玲、陈企霞、馮雪峰都有这种思想，当他們受到党的批評的时候，他們主要的鋒芒是向党复仇。因此，他們也就不可能不把自己放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位！

丁、陈反党集团極端个人主义的政治思想、文艺思想，一方面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相通，另一方面則在許多地方和胡風思想一致的。

一 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想相通

去年二月間，苏共举行了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設的新經驗，同时揭露了党内的缺点：斯大林的錯誤和个人崇拜的流行。是的，在那些日子，当人們突然听到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共产党犯了錯誤，而且还是一个有很高荣誉的領導者斯大林犯了錯誤，这是震惊了世界的进步知識界的。

問題在于我們怎样分析这些錯誤，認識这些錯誤。苏共党的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生命力。

这时候，国际帝国主义者却認為有机可趁，他們在匈牙利制造武裝暴乱，企圖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在西方世界煽起瘋狂的反共浪潮，并趁机發动了侵埃战争。

每个人在这样的大風浪前，都必須經受时代的考驗。

一切进步的、有和平願望的人士，一切坚决的、忠貞的共产党人，欢迎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自我批評，拥护苏联对匈牙利、埃及事件的決定。他們像高尔基歌頌的海燕一样，在風暴前飞得更快，唱得更响。但是有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識分子和作家，却正是在这样一些大是大非之前迷失了方向，他們对社会主义的巩固和發展，失去了信心。美国的法斯特認為苏联从此以后举起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以及掌握世界道义上的領導权，都已經沒有希望了。

丁、陈反党集团的成員們在这一国际反共風暴前面，又是如何看法的呢？馮雪峰同情法斯特的叛党行为。并且說：“人类沒有希望了，”陈涌也說得很清楚：“斯大林批判、匈牙利事件后，我思想上有变化，苏共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心目中威望降低。”

當他們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已失去信心的时候，就走向修正主义者的道路。这反映到文艺上来：1、就是否定文艺的党性的原則，認為文艺可以脱离党的領導。匈牙利的蘆卡契对党在文化事業中的領導作用表示怀疑；波蘭的楊·柯特認為对艺术的最好領導方式是所謂“自治”；2、就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文艺事業的成就，采取輕視、甚至一笔抹煞的态度；3、就是在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侯，反对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提法。丁、陈反党集团的文艺思想，不也是和这些很相似嗎？他們不也是千方百計企圖使文艺事業脱离党的領導

嗎？他們不也是對新文藝事業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嗎？他們不也是盡力貶低文藝對群眾的教育作用，片面地強調所謂真實性嗎？

丁、陳反黨集團和匈牙利的裴多斐俱樂部自然是有所區別的。可是，它們之間的許多地方是那麼不謀而合的。裴多斐俱樂部干點什麼呢？寫詩的不寫詩，寫小說的不寫小說，不研究自己的業務，而是湊在一起散布流言蜚語，“自由”地反黨、反政府，在反對“斯大林主義”、“拉科西分子”的口號下結成了反黨反人民的統一戰綫，極力夸大黨的缺點，肆意破壞黨的威信。

丁、陳反黨集團的分子也是如此；他們在一道大吃、大喝、大談，談的都是對黨不利的話，挑撥離間的話，反黨的話。由艾青請客的一次酒會上。有人提出：“我們這簡直像裴多斐俱樂部。”

這句話可能是開玩笑說說的，但是，這正是一種真情流露，說明它們之間的思想基礎，如果不是完全一致，至少是相當一致的。說到這裡，不能不使我們想起一位曾經到中國作過短期訪問的意大利作家馬拉巴德。馬拉巴德在一九五六年來我國參加魯迅紀念會，當他回到意大利後，在一篇“向中國致敬”的文章中說：“……我看到了一個為了建設現代的、自由的、正確的、人道的大國向貧窮的遺產和過去的痛苦作堅決鬥爭的民族，這樣的民族才懂得表示他們的善良、寬大的手足之情。”在另一篇文章

中他說：“我愛中國，我愛中國人；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我所做的一切。不管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我將永遠站在他們一邊。”是的，這正是他在中国逗留的短短時期中，思想上所起的巨大變化。不幸得很，他害了不治之症的毒瘤病。最後彌留期間，他堅決地提出了要求參加意大利共產黨，這要求得到了意共的批准。在他臨死的遺囑上，他說要把他在意大利的別墅和家具，都贈送給中國作家，他見不到中國朋友了，但是他要讓中國朋友們住在他自己的房子里，使用他曾經使用過的家具。同志們，請看，這是一個有良心的意大利作家，在很短時期接觸了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之後，加強了他對共產黨的信念，加強了對中國人民的愛。而丁、陳反黨集團分子們，長期受到黨的培養，受到人民的愛護，他們卻是仇恨黨，分裂黨，他們在這樣一位意大利作家之前，能不感到羞恥嗎？他們到底還有沒有一點階級良心，黨的良心？難道還不值得深思嗎？

二 在許多地方和胡風思想一致

丁、陳反黨集團的成員們和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們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那就是：極端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極端的資產階級唯心論；他們一致的輕蔑世界、輕蔑人民、輕蔑組織和集體的力，同時，夸大個人的作用。在胡風那里是“萬物皆備於我”；“自我擴張”。在丁、陳反黨集團那里是“自我中心”、“獨打天下”、“一本書主義”。

当他們得意的时候，飞揚跋扈，不可一世，在一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之后，陈企霞对柳溪說：“这一回我講話三點鐘，講了以后会場立刻就哄起来了。……好，这一下我把他們做了半月的肃反总结，叫我三个鐘头就推翻了。”这和胡風在一九五四年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上講話之后的神态，簡直一模一样。胡風在給方然的信中說：“荒胖子（胡風自称）作了三小時的發言……画出了宗派統治特征，要他們承認。……会后反映好，打动了人。”还說：“这样，打乱了他們的日程表，斗争正式开展了。”陈企霞、胡風都把自己描写成是“盖世英雄”，而党、組織、集体的力量是“不堪一击的”。他們的估計完全錯了，党、組織、集体并不是那么軟弱可欺的。當他們失意的时候呢？又把社会、人类、世界，包括他們自己，一切都看得十分灰暗。在胡風那里是：“人生短促，这不曉得是命运开的甚么玩笑”（一九四四年三月給舒燕的信）；“心緒有些陰暗……好像和世界离开”了（一九四四年五月給舒燕的信）。在丁、陈反党集团那里是：“人类沒有希望”（馮雪峰），“七顆子彈，最后一顆打死自己”（陈企霞），“坟墓里剛爬出来的人”（丁玲）。并从而对党、对新社会怀着刻骨之恨，以致达到瘋狂的程度：“讓人們瘋狂，从瘋狂里灭亡”（阿壠給罗洛的信），“几乎恨一切人……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張中曉給胡風的信），“瘋狂的报复主义”（陈企霞），“我仇恨！我仇恨！”（李又然）。

在文艺思想上，他們都是企圖以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綫來代替工人階級文藝路綫。胡風所反對的几把“理論刀子”——共产主义的世界觀、工农兵方向、作家的思想改造、民族遺產等等，丁、陳反黨集團那里同樣反對。丁、陳反黨集團所擬議中的同人刊物，並不是什麼在黨領導下，在社会主义思想基礎上的、有獨特風格的文學流派。完全是反黨的宗派結合，是胡風的七月、希望等等，在新條件、新形勢下的再現。

這個同人刊物首先是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向的。馮雪峰的文藝思想，是直接和毛主席的文藝方向相抵觸的。他和胡風一樣，都認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過是馬列主義的A B C。是經不起一連三個反問，加以推敲的。現在再來听听他們中另一位理論家陳涌是怎樣講的，他在文藝報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對這個同人刊物的思想綱領做了系統的說明。

他把政治標準壓下去，把藝術標準提到第一位。甚至“藝術即政治”。完全是胡風分子阿壠的觀點。我們提出“反對脫離政治的傾向”，他提出另一個荒謬的口號與此對立。那口號是所謂“反對脫離藝術的傾向”。這個口號本身就不通：藝術怎末可以脫離藝術呢？自己脫離自己。這無異說：陳涌可以脫離楊思仲。他又認為：強調“政治標準第一、技術標準第二”，就是僵死的、形而上學的。

其次，反對黨的領導，誣蔑黨對文藝的領導是教條主